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嚴前總統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一日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三十週年慶祝會致詞

doi:10.30390/ISC.198304\_22(7).0001

問題與研究, 22(7), 1983

Wenti Yu Yanjiu, 22(7), 1983

作者/Author :

頁數/Page : 1-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3/04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4_22(7).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嚴前總統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一日在

###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三十週年慶祝會致詞

主席、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是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成立三十週年的紀念日。家淦能够應邀參加這次深具歷史意義的慶祝大會，參觀中心同仁研究成果的著作展覽，甚感欣慰。

在三十年前的今天，也就是民國四十二年的四月一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國際關係研究會在臺北宣告成立。當時正值中共竊據大陸、政府播遷臺灣之後的第四個年頭，國家遭逢危難，國際情勢也很險惡。因此，先總統 蔣公對於國際關係研究會的成立，曾經寄予殷切的期望，並且特別提示了這個研究會的三項主要任務：第一、是要提供有關政略和戰略的資料與意見，藉備政府決策的參考；第二、是要就國際間及大陸共區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適時的提出研究報告與意見；第三、是要透過研究成果，加強國內外學術聯繫，並促進國際人士對我國的了解與支持。

在過去三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稱，雖然一改而為國際關係研究所，再改而為今天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但是這個研究機構的工作任務，則始終秉持着先總統 蔣公的固有昭示，並且隨着時勢的演進而不斷的予以擴大、加強。特別是在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國際姑息浪潮更見高漲，中共的國際統戰陰謀也更加惡毒。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對於國際學術聯繫與交流的推展，更是不遺餘力，而且頗多成效。目前中心出版的許多專書和七種刊物，不但行銷國內，而且享譽國際。在中心的主動策劃之下，我國和美國、日本、韓國及菲律賓等國的學者專家們，分別舉行每年一次的「中國大陸問題」或「國際共黨問題」研討會，對於協助國際人士正確了解大陸情況，發生

了普遍而深遠的影響。中心研究人員的出國訪問及其與來訪外賓舉行座談，交換意見，對於我國反共國策的宣揚與大陸共產暴政的揭發，更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過去三十年以來，中心研究人員以及國內其他有關學者專家們，在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上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並曾針對中共在黨、政、軍、經濟及文教等各方面所發生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正確的研判或獨到的評估。例如我方曾經事先料定「大躍進」的必歸失敗與「人民公社」的終趨瓦解；預測「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並對「文革」的本質提出正確的看法。又如毛澤東死後的中共權力鬭爭、「四人幫」的命運、華國鋒與鄧小平的衝突以及「北京之春」的前景等等，也曾經分別提出正確的判斷。特別是在一九七〇年代期間，西方的學術界和新聞界對於中共毛記政權的吹捧歌頌，呈現出一面倒的趨勢。他們甚至認定：在中共的治理之下，中國大陸社會的平等公正、清純安寧，幾乎已經達到了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境界。而當時我國的研究人員則堅定的指出：共產主義是「非中國的」，它與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是互相排斥的。因此，中共黨徒在中國大陸強迫推行的階級鬭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必將為數億中國人帶來無窮的禍害。然而，當我方研究人員先後提出這些研判評估的時候，西方的學術界和新聞界總是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我方研究人員對共產主義存有偏見，故對中共問題的看法也就難免陷於主觀。一直要等到大陸情勢的發展或中共自己公佈的資料證實了我方的研判或評估之後，西方國家的有關人士乃回過頭來，檢討他們自己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偏失，同時也讚揚我方研究人員的真知遠見。西方人士經過自我反省後，對中國大陸情況所作的真實報導，更反映出我國的研究人員過去對中共問題所作的許多研判與評估，都是很準確的。

談到這裏，也許有人會問：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和國內其他的學者專家們，對於中國大陸情勢的研判評估，為甚麼會比西方人士來得準確呢？家淦認為，這至少要歸功於四個因素：第一、我方研

究人員在心理、語文、歷史、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先天性的優越條件；第二、我方研究人員中的資深學者專家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他們與中共的重要幹部曾經有過直接交往的親身體驗；第三、我方研究人員對於中共歷史與「革命」理論都有深刻的了解，對於中共政權的特質與企圖更有獨到的研判；第四、我方研究人員所掌握的資料，除了中共出版的報刊書籍和大陸各地廣播電臺的消息言論之外，更有來自敵後的可靠情報，並與歷年來投奔自由的大陸同胞，保持接觸。在這些有利的因素之下，我方研究人員乃能對中共人物的身世、個性、心態以及行為動機，觀察入微；並能對中國大陸重大事件如權力鬭爭、整風運動、政策路線等的發生背景及其可能演變，加以精闢的研析與適切的預測。因此，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當中，我方研究人員在中共問題的研究上所獲得的成就，確實是西方人士無法企及的。

不過從目前的情形來看，西方的學術界和新聞界對於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正在急起直追，似有迎頭趕上，甚或超越我方的趨勢。因為這些西方人士已經從七〇年代的所謂「中國熱」中醒悟過來，解脫出來。他們摒棄了往昔幻想式的浪漫傾向，轉而採取了理性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來探討問題，尋求答案。尤其是近年來，中共為了加強推展國際統戰，已在偽裝民主，故示開放。因此，西方人士不但能到中國大陸去旅遊觀光，而且可以在那裏從事實地考察或作個案研究。在這種便利之下，西方學者專家們對中共幹部的訪晤會談，以及對中國大陸事務的身臨目睹，便都可以作為他們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第一手資料。面對此一事實，我方研究人員今後在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上，除了繼續發揮本身所具備的先天性優越條件之外，更應該在觀念上尋求突破，在方法上力圖改進，在資料上另謀補充。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採用多樣性的科學研究方法，並對西方學術界出版的有關書刊與新聞界所作的有關報導，注意研讀，多加參考。這樣一來，我方研究人員對於大陸情勢的未來演變必能提供更客觀更準確的研判與評估，也必能長久保持我方在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上所創造的

光榮紀錄。

除了中國大陸問題之外，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另一重要研究項目，自然是國際關係方面的問題。由於國際問題的範圍廣及全球，而其性質又是錯綜複雜，瞬息萬變，所以現在中心設有三個研究組，俾就一般國際問題、國際共黨問題以及經濟問題，分別進行探討。家淦認為：今天世界的地理距離已是越來越小，各國相互依存的程度則是越來越大。儘管國際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具有不同的色彩，但其演變都可能影響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因此，中心的各研究組在探討任何一個國際問題的時候，應該互相協調，通力合作，一方面要秉持客觀的態度，從事學術性的研究；一方面更要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剖析各種國際情勢與我國的利害關係。這是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今後努力的重要課題。

我們知道：今天共產主義社會由於其基本哲學錯誤，以及對於人性的扭曲，都普遍產生信仰危機、經濟停滯、官僚專斷以及民衆反對。在這方面，我們特別注意到美國總統雷根最近在言論上不斷指出共產主義的禍害與沒落，另一方面也倡導在鐵幕後面推動民主化運動。這與先總統 蔣公所揭示的從大陸背後光復大陸的政略是一致的，也與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與方案相切合。未來如何使我國對世局，特別是對中國大陸情勢的了解與看法，為國際人士所尊重與支持，從而提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也是我國學術界重要的課題。

最後，家淦願意趁此機會，預祝中心前途光明遠大，並且在學術研究與國際活動方面都能隨着歲月的增長而獲得更豐碩的成果，俾為我國反共復國的大業作出更大更多的貢獻。謝謝。